



钟楼街史话之

千年街史略钩沉

14 钟楼街沿革及钟楼之殇 (下)

王继祖 王琛

万历年建钟楼之殇

明代万历年间,迁址重建于钟楼街中段街南的钟楼,很多年来一直传说,由傅山之祖傅霖主事所建。傅霖之所以撰写《重修钟楼说》之文,或许是最好之佐证。我们试以万历十二年(1584)为此楼重建的起始年代,迄1931年,因年久失修随时会塌圯而拆去计算,前后存在了347年。出生于1921年前后的太原人,似乎应该有个比较清楚的记忆。我曾听祖父辈人讲,也见到过文字记载,明万历年间起建的钟楼,虽“规制若城(楼)小”,不及原钟楼、鼓楼和八座城门之门楼巍峨雄宏,但是,却玲珑娟秀,体态多姿。它分台基和楼阁两部分,下部台基夯土而成,外券巨砖,台面呈方形,台壁呈梯形,单拱门洞,供人通行。台上砖砌十字花栏女墙,高三尺许。台梯在台之南壁,为八字两折对叠,拾阶而上可登临。上部楼阁三层五丈,为外三内二式。整个造型重檐宏葺,椽拱飞扬,十字歇山结顶。楼阁中硕大的门字钟架上高悬巨钟一口,据说高达丈余,重逾千斤,是明初大钟楼之遗物。每逢报时,声闻四达,远播城之内外,在绵久雄宏的钟声中有一丝丝裂声。钟楼有巨匾曰“晁氏洪声”,是否亦为所拆明初大钟楼之遗物?不得而知。

此匾文何意?所谓“晁氏”,乃为周代古官名,《周礼·考工记·凫氏》曰:“凫氏为钟”。凫氏者,大约是专管铸冶钟彝之器的官员吧。钟、钟两字,古时通用。《诗经·小雅·鼓钟》有“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句可证。今简化字更把钟、鐘,以“钟”化而为一,意无所歧。至于“洪声”,望文可知其意,无需再费笔墨。

应该说,万历年间迁址重建的钟楼和钟楼街上曾经有过的“打钟寺”之小钟楼、明初洪武间所建之大钟楼共三座钟楼中,万历年间迁址重建的钟楼是存世时间最长、跨越朝代最多、历史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古代建筑。明清以来诸多太原府志中所载的“钟楼”史料,绝大多数专指于它。但是,钟楼街之得名却不是因它,而是它的前身:“明初洪武间所建大钟楼”。当然更不可能是金元时期“打钟寺”的“小钟楼”了。

这座万历钟楼在其存世的近350年间,一经问世便目睹了万历十四年(1586)的“太原大荒,米珠薪桂,人至相食”,目睹了曾经为建它而四处奔走的傅霖,为解太原饥民之倒悬,“解囊慨助,施粥百日,米费四百斛”的壮行义举;万历二十九年、三十年目睹了“太原

复大饥。(傅)霖于小弥陀寺(故址在今馒头巷),焚火地炕收宿,贫人有病死者,施棺埋葬。复施粥,起冬月至来年熟乃止,活众数万”的“敦仁”“尚义”之善举;目睹了明末李自成义军毁大南关城、攻占太原以及清军用红夷洋炮轰塌太原城西北角等大战乱;尤其是目睹了这两次战乱,将太原商家驱赶于钟楼街、打钟寺、开化寺,歪打正着地促进了太原商市之北上东进,造就了两座寺庙的商市化嬗变,造就了钟楼街百年商市之成形,使之终于发展成执太原商贸业之牛耳的大势。

但是,作为钟楼街百年商市的目证者“万历建钟楼”,两百多年无人修葺,无人问津。直到清道光二十年,眼见钟楼将圯将废,一个姓崔的阳曲县知县,才在“宪谕”(上司的命令)督促下,草草给予补残守缺的所谓重修。“宪谕”是发白于太原府知府,还是山西布政司使?志乘未见详载,似须后人再费一番心思。或曰,你如何就能断定崔知县是草草修葺?其实这有何难,道光二十年是1840年,至1931年,一座传统的古代木构建筑毁坏至此,质量如何?可以想见。而在清末,钟楼已近废弃破败不堪,时人皆知,多有呼吁。道光年之修是否草草,可以想见。加之当时时局,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侵扰……国难频频,卖国契约不断,国将不国,又有谁去关心一个“行将破败”的钟楼。

反观鼓楼,与明初大钟楼同期问世,因所居为巡抚衙前,而得到官家长期呵护,所以从创建的洪武九年(1376)后,尚能经得起火烧和火炮的轰击而不垂,是在治理战争创伤的20世纪50年代初才被拆除,告别了这个世界,存在了563个春秋。而多灾多难的钟楼,虽与鼓楼同创于明初,却在万历的十二年、十三年间,替天灾背罪,为人祸罹难,夭折于不知名的“罪过”,被拆毁于一旦,存世仅仅两百余年,不足鼓楼之半数,文其“钟楼之殇”,干真万确。

无论如何,万历年间旧楼拆去,还建新楼,终有传统。迁建于新址的钟楼,虽规制大降,雄风不再,难与当年的兄弟鼓楼同日而语,但是,其仍不失为钟楼街上最伟岸之建筑。可惜的是不济的命运并没有改变,仍是得不到官家的垂爱,又是两百多年失修,直至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将近尾声的道光二十年(1840)才被草草修葺。作为那时阳曲县在任知县的崔光笏并不是主动修楼,而是在“宪谕”的指令下被迫完成。苦命的钟楼,虽经重建,到1931年,尚不足百年,便又成破败不堪,老气横秋,濒临塌圯。

当时,经过一番商讨后,给出政策:谁拆除危楼,危楼能用之材归谁,空出之地由谁使用。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拆楼条件虽优,但投入人力、物力颇费,得不偿失。但是,这个难占便宜的政策却被晚期晋商翹楚、榆次陆堡人贾继英不动声色地转化为一项发财的好营生。这个贾继英就是当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出逃北京,以避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难,“西狩”西安,途经太原钱粮困顿难以为继时,慷慨解囊捐助30万两白银的晋商后起之秀。

久住太原的贾继英熟知太原民风民情,他盘下拆除钟楼工程后,于1931年张榜公示,钟楼台基之大砖,谁拆谁搬归谁,分文不取;台基之夯土,土方量颇大。贾氏知太原城民终年使用煤泥、煤糕,为做饭取暖之必须之材,而煤泥、煤糕制作材料之一——烧土,都取自东山上岭。每车烧土价格在一毛、八分之间,所以,城中有一项专门行业,叫做“卖烧土”。贾氏规定,钟楼之土,每车一律五分(旧币五佰)。拉土卖土者闻听,土价贱东山一半,而路途之近就在咫尺。就近拉土卖土,力半而功倍,何乐而不为。至于钟楼之木材、建材,亦便宜估价而售。

结果,很快把将圯之钟楼拆除得干干净净,不仅分文未花,反而多有收获。很快,贾氏在万历钟楼故址上盖起了两层新式洋楼,筹建了省会城中最大的五金商行——斌记五金商行。“斌记”的问世,宣布了太原钟楼街上最后一座钟楼之殇。这条以钟楼命名的古街,在1931年后,成为只有“钟楼街”之名而无“钟楼”之实的商业街。万历钟楼之殇,或许正是这个“百年商市”极尽繁华之后行将衰退的一个信号或象征。

元亡明兴之初,随着太原城的扩展拓建,过往的“东门正街”因明初大钟楼的问世而更名“钟楼街”。明代之前宋金之数百年间,一直被府城使用了多少年的“打钟寺”钟楼,因失去城中报时的功能而殇逝了。万历年间,谢成于明初所建之大钟楼,又因众人皆知知之不清的“替罪”而夭折,沿演了钟楼街上第二次“钟楼之殇”。1931年,万历年所建的钟楼又因年久失修,有碍会城观览且有伤人之虞,而被拆除得干干净净,遗址不存。太原城中千年之街钟楼街上,最后的“钟楼之殇”也宣告终结。百年商市钟楼街成了没有钟楼的钟楼街。或许,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或许,一座崭新的钟楼将在故址上涅槃重生。太原的人们期盼着!

盼天明

正当百年商市在煎熬中挣扎、力图重振时,等来的却是卢沟桥事变。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于日本侵略军之手,太原经济遭到严重的掠夺和空前的破坏,百年商市钟楼街陷入灾难深重的苦海。

仅据1937年至1940年的资料统计,便可看到太原市商业殖民化、日货充斥市场的程度有多深,太原的民族商业被排挤、衰落情况之严重。在沦陷时期,全市工商业户数减少一半以上,所受直接损失达22.26290562亿元,其中便包含着百年商市钟楼街上的巨大损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待民族工商业复苏,官僚资本便迅速占领太原市场,它们依靠官僚特权,疯狂地兼并加吞并,初看向好的百年商市钟楼街,经过了一个短期的“假象繁荣”后很快衰落。据有关资料显示,“1946年底到1947年初,太原商号有3766家;到1947年底1948年初,降为3184家;到1949年太原解放前夕,全市商号已降到1590家”,而且,惨淡经营,看不到前景,倒闭和消失数达50%。从当时全市商号、商铺的迅速衰退中,完全可以看到作为太原百年商市的钟楼街已经接近完全崩溃的边缘。全市人民,包括全市的工商贸易从业者,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翘盼人民解放军的拯救,翘盼天明,翘盼着百年商市万莫夭折,翘盼着百年商市的劫后重生。



本版绘图:季和

纪实

于是赵忠尧就随口应道:“好,我考虑一下。”

密立根教授是物理学的权威,又是一个很有修养的西方人,即使已经做了决定,不容商议的事,他也会彬彬有礼地说一句“请你考虑一下”,以示尊重对方。可是,赵忠尧偏偏没有理解这“考虑”的真实含义,竟然“给个棒槌就当针(真)”了。密立根教授一听,面露愠色地说:“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相当重要。我看了你的成绩,觉得你做还比较合适。你要是不做,告诉我就是了,不必再考虑。”

赵忠尧虽然是个实在人,却并非冬烘先生,一听这话才明白,这是老师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挑选,才为他“度身定制”的

题目,是出于对他的深厚期望才交给他的,自己确实没有必要再“考虑”了。他立刻表示愿意做这个题目,密立根教授才露出满意的神情。

实验是艰苦的。那时,赵忠尧上午上课,下午准备仪器,只有在晚上夜深人静时,才能进行实验。这个实验要求半个小时取一次数据,而且要通宵达旦地做。已经劳累了一整日的赵忠尧只好靠闹钟把自己从困倦中催醒,坚持把实验做下去。科学的发现既需要创新意识,也需要认真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尤其是有科研工作,需要做大量烦琐的、枯燥乏味的实验。

赵忠尧就一直以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坚持把实验做下去。实验的

山西教育出版社

102

边东子 著



《中关村特楼》节选

结果出人意料,也令人惊喜。他发现:轻元素和重元素吸收硬伽马射线的情况是不同的,只有在通过轻元素时硬伽马射线的吸收才和当时通行的一个公式相吻合;而通过铅这样的重元素时,却比用那个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大了近百分之四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连载

北岳文艺出版社

102

张卫平 著



《红色银行》节选

“鬼子少尉军阶不高地位重要!这家伙是鬼子司令部的作战参谋,耳朵受过伤,落入咱的手里。”

白宝明不懂得司令部参谋是干什么的,一直惦记着这家伙到底有用没用:这家伙有用吗?

甄排长敲一下白宝明的头:这是啥子问题?鬼子司令部的参谋哎

——同志哥,能没有用吗?

大伙哈哈笑起来。

六

快到年底的时候钞票终于印了出来。

先是印了一批一角的票子,接着一鼓作气又印了一批二角的。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些票子是抗战时期几个根据地里最早印出的一批货币。这些货币由于是用当地的土纸印制,加上流通数量有限,传到今天的实物非常稀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政府为了找到“兴县农民银行”货币实物,向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曾广泛征集“兴县农民银行”货币。经过宣传发动,1989年10月终于从当地一位收藏者手里找到了一张保存了几十年的“兴县农民银行”一元券珍贵实物。

刘象庚打发白宝明到长兴堂现场监印。刘象庚告诉白宝明:宝明啊,你就在现场盯着点,这可是票子,不可有个闪失啊。

白宝明就白天黑夜在长兴堂那里盯着。为了保密,长兴堂白天也上着门板,屋子里点着灯,两个工人连明昼夜印着钞票。机器是手工操作,把刻好的石板架上去,铺好纸张,打上油墨就能开印了。

当时还没有购回专门印刷钞票的纸张,刘向庚只好让田掌柜用长兴堂存储的土纸代替。这种纸非常粗糙,既薄又软,也不易保存。

小说